

每週論壇

眾議園

(本版園地 歡迎來稿 文責自負 不設稿酬)

任志強社長的信

(/Common/Reader/Stat/BanStat.jsp?

Itmid=8527&Bid=499&Pid=2&Version=1705&Charset=big5_hkscs&url=https%3A%2F%2Fchristiantime

時代學堂 | 神學早點

饒申布士、 社會福音與今日香港

網上教學平台

任志強博士

(/Common/Reader/Stat/BanStat.jsp?

Itmid=8639&Bid=34&Pid=2&Version=1705&Charset=big5_hkscs&url=https%3A%2F%2Fchristiantime

首頁 (/Common/Reader/Version>Show.jsp?Pid=101&Version=0&Charset=big5_hkscs) > 每週論壇

> 1705期.2020年5月3日 (/Common/Reader/Version>Show.jsp?

Pid=2&Version=1705&Charset=big5_hkscs) > 眾議園 > 面對病毒的日子看國民身份認同

面對病毒的日子看國民身份認同

梁永泰 / 2020年4月29日



為甚麼要探討國民身份認同

香港華人基督徒想起身份認同，會想到天國國民身份，我們在世不屬於世界，正如Stanley Hauerwas所說的異類僑居者，我們在世上只是客旅。

有人認為要愛你的鄰舍，愛人如己，所以我們是關懷者，正如Warren Carter提出馬太福音是給邊緣人的福音。好像耶穌出來傳道，引用以賽亞書六十一章：「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見，受壓制的得自由，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，貧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。」（路四18-19）。這些都是好的。許多教會著重傳福音、佈道、宣教，認為這是基督徒首要的任務，所以一切教會活動，都是裝備信徒傳福音；一切工作、教育、媒體，也視為傳福音的工具。

然而，如果我們要進一步探討香港華人信徒的國民身份，就不能脫離處境、時代、地土。「香港人」這個名詞在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提出，之前只有逃亡的難民身份。在英國一百五十年統治下的殖民地身份，只求一宿三餐。

今天回歸二十多年來，香港人對「一國兩制」的解釋，跟大陸人演繹有所不同，就充滿矛盾。例如反國教、反廿三條立法、反對顛覆條例、反對修訂《逃犯條例》等，再加上在區議會、立法會、特首選舉的形式和時間表，對於民主選舉制度的期望落差，產生矛盾。這令市民之間，包括華人基督徒彼此對立。

因此，不能不探討一下我們的身份認同，要超越只是傳福音給貧窮的人、愛鄰舍、天國子民的身份等；要進入處境，進入時代，地土的考慮。現在甚至將來，更因為中美貿易戰爭、冠狀病毒疫情惡化的趨勢、反全球化的勢力，國民身份認同，都會愈來愈顯得重要。

回歸廿五年前後的身份認同

香港人一直很關心中國大陸的同胞，任何水災、地震，香港人第一個挺身而出，出錢出力。文革後，中國改革開放，對外經商工業活動，香港人第一時間往內地開廠房、作出入口生意，有助中國的生產總值及吸納外匯。

然而，經過一九六七年的暴動，許多人對本地左派恐懼與不滿，十年文革，使人對中國大陸不滿，制度的失責、人吃人的苦難，以及八九年六四民主運動造成的經歷，香港人跟大陸人的距離愈走愈遠。基督徒也不例外，怎樣看待自己的身份認同？怎樣在中國人和香港人的中間看國民身份，當中取捨得確實有點令人心理失調。

一九八四年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，楊牧谷提出「復和神學」，似乎想化解兩地的恩仇。但沒有承認錯誤又怎能復和，沒有身份認同又何必復和？沒有仇恨只有恐懼，怎樣談復和？

一九八四年中英草簽，香港回歸落實方案，對於香港教會起了很大的動盪，很多基督徒，包括教會的領袖以及牧者，紛紛移居海外。於是，一群有心的教會領袖及牧者，寫「信念書」，確認上帝是歷史的神，香港的前途在上帝的手中，我們作為神的子民，只可以靠上帝進入歷史的萬變當中，無畏無懼。

然而，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國慶，產生爭議：應否慶祝香港回歸？回歸是值得慶祝國家脫離羞辱？抑或香港從自由法治跌落到共產主義、極權管治的深淵？結果大家不歡而散，至今仍在兩難間。這直接影響信徒對香港政府的態度，如果某一天香港政府多靠近中國，就會有兩種聲音：一方面支持；另一方面反對。這個原因與我們的身份認同有很大的關係。

這兩種態度的走向，是有軌跡可尋的。例如前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，年輕時曾任《突破雜誌》編輯，書寫「泥土黎民」專欄中，充滿對祖國的情懷。加上他自己是讀歷史，對於中國近代史有深切的了解，理解中國的苦難、基督教與帝國主義連結的情緒。另一方面他亦擔心共產主義，統戰以及對宗教的壓制，對於國內宗教政策十分不安。崇基神學院即將卸任院長邢福增，專門研究中國宗教政策，以及中國教會的發展和所受的迫害，推進這一個對大陸政權的差異，抗議大陸對基督教的政策，尤其是拆十字架。

香港信徒領袖對於大陸處理一些維權份子，尋求自由民主的戰士之死，例如劉曉波、李旺陽，反應是非常激烈的。甚至舉辦一些抗議活動，認定在中國共產黨管治之下，不可能有民主自由，甚至宗教自由會被剝削，必須抗衡，《時代論壇》亦曾警告「強勢政權的來臨」，香港教會怎樣回應？這成為近期的焦點。

許多青年信徒，在佔中、反對修訂《逃犯條例》、國民教育、廿三條立法、自由行、國歌法等議題上，一直是站在中共的對立面，尤其是在八三一、七三一警暴事件，走得最前線。定意捍衛民主、法治、言論自由，以保持香港生活現狀，甚至要中國的民主回歸，是許多人的意願。他們甚至出聲明的時候引經據典，聲稱這是聖經的教訓、神學的最佳結論。極權政府一定要落台，一黨專政必須要結束，中國才有希望。難怪大陸的媒體，最近也在觀察香港教會這方面的傾向，以為是整體的大方向。

另一方面，一些認同要與中國大陸接軌的，包括前崇基神學院院長盧龍光、前中文大學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的吳梓明，積極與國內的學者及教會領袖交往。香港有些主流教會及其媒體，例如《基督教週報》，就走這個溫和的路線，建議承先啟後，延續中國教會在國內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宗教傳統，願意未來彼此合作，這個也是一種身份認同。

徐濟時研究香港教會歷史，回顧香港教會，尤其是福音派信徒的群體，在過去五十年與中國是怎樣相處？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態度，就是香港教會十分關注大陸宗教政策，是怎樣影響今天的中國教會？將來會怎樣影響香港的教會？自我保護的心態非常明顯。在一九八四年中英草簽、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、一九九七年回歸、二〇一四年佔中、二〇一九年冠狀病毒，擔心中國大陸的強國人政治，在經濟起飛之後，大軍壓境，引起不安。

近期，習近平主席所採取的進取政策，例如「一帶一路」，中國二〇二五年工商業的發展藍圖、粵港澳大灣區融合，就令很多香港人再次產生分歧，視之為機會抑或是威脅？各自走向。

習近平提出「不忘初心」、「反貪腐」、要重建「中國夢」，就是貫徹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和「新型大國關係」等。在這一系列前提下，宗教要為國家建設服務，要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，教會教牧同工要再受培訓，收緊不屬於三自教會的家庭聚會點、沒有註冊的聚會所，全部非法。這一系列對於信仰內容、牧者培訓、講道內容、聚會自由上的監控，是前所未有的。看看他們出版的《使徒信經》新釋，可見一斑，既保留傳統解釋，亦加入以中國為本的字眼。



上海

聖經怎樣看國民身份認同

上帝在亞當夏娃犯罪之後，其子孫罪惡極大，上帝用洪水氾濫大地，神拯救挪亞一家，延續人類的生命。挪亞的三個兒子好像是古文明的起始。巴別塔之後，上帝變亂人的口音，容讓不同的文化，各走各路。正如他所吩咐的：孕育大地，生養眾多，遍滿全地。

在古文明之中，有米索不達米亞文明、巴比倫文明、埃及文明、印度文明、中國黃河與長江的文明。當上帝放棄不再用洪水氾濫大地，他選擇亞伯蘭，叫他離開本族父家，去應許之地，要改名亞伯拉罕，萬國要因他的後裔得福。上帝以一個人，一家一族，祝福萬國。所以人有其萬國的關懷，亦都有自己的民族性。

摩西雖然在埃及長大，仍以希伯來人的身份，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在西乃山上，當耶和華要滅絕這些反叛的人民，摩西求情說：情願自己的名字在生命冊上塗抹，也不希望自己的同胞受死，這就是國民身份認同。不是因為自己的國民有任何的好處，也不是他們善良，他們其實是充滿反叛、惡毒、不信。摩西卻以生命交換，拯救自己的國家民族。

使徒保羅一樣，在羅馬國內生長，受希伯來人精英教育，深懂希臘文化成為基督徒之後，每次傳道先向猶太人，然後往外邦人。在羅馬書九至十一章，他說他情願與基督分離，也不希望自己的同胞得不到福音的好處，這就是國民身份認同。

尼希米列祖是希伯來人，亡國亡家後，被巴比倫侵略，後來有新的皇朝波斯國興起，尼希米在波斯政府作高官，聽見本族父家的悲劇，城牆被毀，城門被火焚燒，他向天上的神認罪：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。他認同自己的命脈與民族的命脈連成一線。他就回耶路撒冷重建城牆，重建民族的尊嚴與保護。尼希米有國家與民族身份認同，重建國家的社會、文化，不單是重建宗教生活。

從摩西、保羅、尼希米，甚至但以理、約瑟、以斯帖的例子，我們看見雖然他們對國民有很多的批評，抨擊他們的不是，但他們都有強烈的國民身份認同，他們同時有亞伯拉罕萬國萬族的情懷。在啟示錄廿一章24節，在新天新地當中，世上的君王要帶著他們全部的「榮耀」進入這城。萬族的領袖、萬國的君王將自己本國最優秀的東西，獻給新城耶路撒冷。把本身最優秀的文化，全然獻上。

海外華人國民身份認同

世界華福中心聯絡很多海外華人教會，他們怎樣看國家民族身份？怎樣看自己與中國大陸的關係？海外華人教會視這為傳福音的關係，是福音遍傳的最後一棒。他們遇到的海外華人及中國大陸華人，大多抗拒基督教，因為基督教的宣教士，在侵華歷史當中曾經連結帝國主義，在許多不平等條約之下方便基督教的傳揚。他們又怎樣回答呢？在這些指控之下，海外華人信徒只有提出：基督教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，宣教士對中國社會的貢獻，以一個功能性來作護教，是很普遍的角度。

現在中國宗教政策提出，宗教包括基督教要為國家服務，這一種基督教貢獻的功能性論述，正中下懷。基督教要為國家建設作為出發點，不能批評，要絕對認同，只有功能性的價值。

對香港人來說，從殖民地到香港回歸祖國，比較其他東南亞、亞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國家的殖民路徑不同。其他國家是從殖民走向獨立，而香港由殖民地回歸祖國，在「一國兩制」之下連結。當年《中英聯合聲明》草簽過程中，香港人沒有自我表達的能力。中國否決了「三腳凳」的方案，將香港踢出中英談判。香港人在起草《基本法》上，有一些參與，是一個「鳥籠政策」，鳥籠製作多大，就只有多大。《基本法》的最終解釋權是在人大，所以中國和香港的所謂「兩制」在「一國」之後才會發生，中國給香港多少自由，香港就有多少自由，選舉也是如此，慢慢給一點點。這就是香港人與大陸的基本矛盾。

香港教會與及許多香港人，希望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，發現「一國」漸漸壓倒「兩制」，十分不安，為了福音，有些人移民，有些妥協，有些人激烈對立。整體來說，很難擁有認同與國家同一命脈。

台灣教會是另一個故事，台灣文學在四百年前，是很認同中國大陸，詩人充滿愛國情懷。後來經過荷蘭人的殖民統治，兩岸關係淡化了。其中轉捩點是甲午戰爭的《馬關條約》，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，對台灣人來說，似乎是中國遺棄台灣。而日本人對台灣人相對於南韓人，比較友善。在一九四九年之後，中國大陸國民黨「解放」台灣。先頭部隊陳儀起初廣納有識之士，後來因為衝突，發生「二二八美麗島事件」，追殺台灣本土精英。蔣介石來台後，又開始戒嚴，推行白色恐怖。本土台

灣人對於這些所謂從大陸來的人（國民黨）十分不滿。今天怎能認同中國大陸？台灣人追求本土化、台灣化、去中國化、新台灣人，是理所當然的。他們於民族與國家的認同中掙扎，矛盾出現在本土與及大中華間。

台灣教會跟台灣人一樣，希望保留自己言論自由與及獨立性，有機會向國內人傳福音、做生意。功能性地提出基督教有助現代化的建設，與中國大陸的人連結，與海外華人傳福音。很難說與中國民族同一命脈，很少國家的身份認同。



台北

從沙士至冠狀病毒

二〇〇三年呼吸道感染病毒沙士後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抗疫，開展「自由行」。香港經濟希望藉旅遊業務重新復興，可惜只惠及一些行業，令租金上升，百業困難。

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海嘯，由美國及西方開始，後成為全球災難。西方印銀紙拯救大公司及金融機構，普通市民經濟大倒退。相對而言，中國量化寬鬆、大興土木、增內需，令市民不需要失業；興建高鐵天橋等，善用資源。

二〇一九年冠狀病毒，發現在武漢，擴展至全國、全世界。香港以及西方媒體，甚至國內的一些人士，紛紛說中國政府不重視資訊自由，不重視科學，不重視人的性命，只怕影響經濟，只求維穩，不准人發聲，李文亮醫生被滅聲。武漢舉行萬人宴，武漢封城之前放走了五百萬人，中國十分不負

責任，應該受清算。在中國最困難的日子，外國媒體很多落井下石。另一方面是武漢封城後，中國全國實行小區禁制，雖然死傷人數眾多，確診死亡人數比較官方數字，大幅增加，但整體疫情得到控制，效果顯著。

相對於其他國家：伊朗、意大利、西班牙，甚至英國、法國、美國等，雖然目睹中國及亞洲國家抗疫足足兩個半月，仍未能作準備，以為只是中國及亞洲的問題。當疫情氾濫，大量醫務人員確診，死亡人數日增，就用雙重標準，中國人禁制是限制人身自由，外國人禁制是保障生命。

全球化、中國化、本土化

全球化是大勢所趨，隨著人流物流的發達，供應鏈的相連，世上一切的生產線都連結起來。從貿易戰、病毒入侵以來，人要進行反全球化，獨立生產，自力更新，是反潮流，不容易發生。反而要探討在全球化下，怎樣合作解決全球面對的共同問題。

全球化的視野與亞伯拉罕祝福萬國萬邦，同出一轍。全球化展開，在各國互動之下，要保持多元而非西方化、美國化、中國化。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，認為台灣要貢獻自己本土文化，全球化之所以多姿采，不是劃一，而是不同，更多保護本土文物，才能達致全球化。本土化以及全球化，是可以並行的。

在香港，本土化是非常重要。過去廿五年重視「兩制」，未來廿五年重視「一國」。很多人恐怕香港的法治精神、自由生活受損。有人用口號：「光復香港」，極力制止香港大陸化，結果當政府靠近中國立場，就提出「本土」意識。然而中國很大反應，怕香港成為反共基地，就定性為「港獨」或是西方的「顏色革命」，於是惡性循環，談不上香港與中國同一命脈。其實本土化、中國化、全球化是否可以包容並兼，也可以是香港的出路。

我們能否脫離難民心態，以香港為家，建立本土意識？我們可與中國同一命脈？以地球村為一體？建立全球視野，包容定兼，是未來的課題。

有人提出只需要有全球公民身份，不談民族國家，不談本土文化，這樣的人可能沒有根，只是浮光掠影，花果飄零。自己就成為一個商品，擇草而居。沒有歷史，沒有文化，人生就沒有重量，又怎能建立身份的認同呢？



香港

神學與教育的先天不足

為甚麼香港華人教會信徒的身份認同，缺乏理念及信仰反思？因為他們幼年在殖民地長大，受英國及美國等西方傳媒塑造的世界觀影響，以為西方式的民主、自由、資本主義等，是唯一可取的發展路線。另一方面，對香港歷史、中國歷史認識不足。在殖民地教育下，沒有中國的近代史。如果從近代史看中國，亦會多看見負面的東西，如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、八九年六四事件等，看不到中國大陸其他方面的改進，例如擺脫貧窮、擺脫文盲、很多建設、民生改善、言論自由、出入境自由，大致比以前進步。沒有整全歷史的視野，怎能說認同呢？

香港教會過去五十年的神學，多是依從西方保守信仰的傳統，重視個人信仰、宣教佈道，聖潔與凡俗分離，政治與教會分離，互不干預，重視救恩論、教會論、三一論等。直至最近開始看創造論、環境論，至於文化及其他方面，例如經濟結構、社會整體，是非常缺乏。近期提出的創造關懷（creation care）、公義會議（Justice Conference）和公共空間，政教關係只是一個開始，仍然缺乏一個整全的基督徒世界觀、價值觀、歷史觀和未來觀。這都令大家難以閱讀時代，更不可能發出先知的聲音。

在教育方面，包括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，功能主義至上，以為「語言」只是溝通的工具，很多人以為西方發展最好，就鼓勵子女只學英文，不學中文，返國際學校，往外國讀書，回港之後，是一個沒有根的黃皮膚外國人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以為中國興起，要學華語，視中國是一個商業機會，但他們不知道語言就是文化的一種。文化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核心，身份認同不能脫離文化，不能只有工具性的語言。

在功能至上的香港，科技與工商管理至高無上，比較著重某些科目，如科技工程數學（STEM）等，非常忽略其他科目，例如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神學、藝術，甚至社會科學等。我們的教育與人生，是有軀殼沒有靈魂，有技術沒有目的。

因此選擇社會領袖例如特首、機構主管、政府高官，是從商業管理、官僚架構或專業人士當中抽取出來。商人以謀求經濟為最大利益，對於其他人文精神欠奉。出自政府官僚架構的，只有執行和解決問題，缺乏長遠的眼光遠視野。專業人士只是一個專業階梯遊戲的成功者，所以我們的領袖缺乏長遠眼光、世界觀、價值觀，以及對於社會的宏觀思考。一旦面對著大時代、金融海嘯、冠狀病毒、一國兩制等，就措手不及。只有帶來人民與政府的衝突，少年人與警察的衝突，導致兩敗俱傷，這是因為我們文化和神學背景不足，所引致的嚴重後果。

未來的日子身份認同再上路

如果我們記得，神第一件吩咐亞當做的事，就是替萬物起名。神吩咐亞當夏娃管理伊甸園，孕育大地，這就是信仰與人生的開始。關係性、群體性、生態性、地土性是人與神，以及人與大地的基礎。神創造人有關係性，身份認同也需如此——我們與大地的身份、歷史身份、人際身份、社會身份、世界公民身份。天國身份、文化身份、傳統身份、個人身份、國家民族身份等等，都是與關係有關。

如果我們能與香港一起浮沉，與中國同一命脈，與世界同一呼吸，與歷史認同，與未來連結，也許香港華人教會就能減少衝突，超越分歧，共創明天。正如保羅在以弗所書所說：萬物在基督裡同歸於一，我們都是一家人了。

(作者為恩光書院院長)



疾風中企硬

(/Common/Reader/Stat/BanStat.jsp?

Itmid=2505&Bid=505&Pid=2&Version=1705&Charset=big5_hkscs&url=http%3A%2F%2Fchristianti